

蝶恋花 · 婚变于负气 · 女皇梦

—— 毛泽东的三位夫人

（一）杨开慧

她和毛泽东的爱是浪漫的， 她和他的婚事也特别“新潮”。

她很有个性。

她拒绝登报脱离夫妻关系， 终被杀害。

一般认为，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原配夫人，这是革命者的新的婚姻观。按旧礼俗，他有“明媒正娶”的夫人，那就是罗氏。其名已不可知，她比毛泽东大 6 岁，20 岁和只有 14 岁的毛泽东成婚。她很不幸，毛泽东不喜欢她，尽管她孝敬公婆，勤苦劳作，但个人生活郁闷不舒，22 岁便病逝于韶山冲。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谈话时这样提及她：“我 14 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个 20 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

罗氏病逝时，毛泽东也只十六七岁，还没有成年，那样的社会环境，他在婚姻问题上也不能自主。罗氏的不幸，只能说是封建礼教的害人。

毛泽东本人不承认，我们无须把原配夫人的头衔加于罗氏。

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之前，曾有一位关系密切的女朋友——

陶斯咏。她和毛泽东是同乡，又是长沙一师的同学，毛泽东岳父杨昌济有三位得意的的女弟子；向警予、任培道、陶斯咏。他们的恋情没有维持多久，陶斯咏便离开毛泽东，去上海办教育，她主张教育救国，创立了“立达书院”，可惜红颜命薄，1932年逝去。如此看来，毛泽东和陶斯咏中断恋爱关系主要是政见不合。

对于毛陶之间的关系，杨开慧在自述里曾以痛苦的心情婉转地提到过。毛泽东最后还是选择了杨开慧，根本原因便是志同道合。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杨昌济（字怀中）是北京大学教授。1901年11月，杨开慧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的板仓。

她不满3岁时，父亲杨昌济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远涉重洋留学去了，杨开慧在母亲向振熙的抚养下度过童年。

开慧长到7岁，爸爸从国外来信，嘱咐妈妈要开慧上学读书。板仓女孩子还没有上学读书的，杨开慧开了风气之先。她家斜对门的杨公庙，办了第四十初级小学。学校破例为开慧等7个女孩子单开了一个班。开慧在杨公庙小学读了三个学期，转到离板仓5里多路的储能学校。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她又转到衡粹女校。这个学校办了实业科，可以学编织、缝纫、绣花等。校长是留学日本回来的，思想进步，有时给学生讲日本的明治维新，讲广州起义黄花岗72烈士，讲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给学生们灌输初步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后因衡粹女校要迁到长沙去，杨开慧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

1912年杨昌济从国外归来，任教于长沙湖南省立一师，全家从乡下迁来长沙，住在大鹅塘。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杨昌济以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吸引着向上有为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经常去杨寓向老师请教各种问题。

从迁居长沙到1920年1月杨昌济病逝，杨开慧没有进入学

校，在家里由父亲指导自学。当毛泽东等来家向父亲请教时，她总是搬一条小凳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论治学、做人之道，研讨朝代兴衰，探寻救国救民真理。

毛泽东和杨开慧日渐熟悉，毛泽东像兄长一样照顾比自己小8岁的师妹。

1918年5月，杨昌济受聘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17岁的杨开慧随家迁移北京，不久，杨昌济染病，杨开慧日夜侍汤药于病榻之侧，并为爸爸读书读报。每期《新青年》是必读之物，从这里，杨开慧汲取了许多新思想新道德。

1918年秋，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他去看望老师杨昌济并在杨寓小住。

杨先生和师母见到毛泽东，十分快慰，帮助他妥善地安排在北京的生活。这时的杨开慧，正当豆蔻年花，对于毛泽东，虽然相识多年了，但这次见面，心中却有一种异样的感情。在父母的促成下，他们相爱了，故宫、北海、香山，都留下了他们的游踪。秋天的红叶，冬天的白梅，在这一对年轻人的心目中留下美好的记忆。他们的爱情像红叶那样艳丽，像白梅那样纯洁。

杨开慧喜书法，懂诗词，不事粉黛，志存高远，这使毛泽东非常爱慕。一日，毛泽东向开慧要诗。开慧说：“我喜欢诗，但作不好，临时应酬更写不出来，去年在长沙时，因和周南女中李一纯要好，曾送她两册精装的诗韵。李一纯买了两盆菊花回赠。我曾作过一首诗答谢。”说到这里，略一沉吟，吟诵道：

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

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

月夜幽思永，楼台入暮遮。

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

毛泽东用心听着，小声重复着，体味诗中的含意。待听完，笑着说：“霞，这诗赠给我不是很合适吗！”开慧脸色绯红，细一回

味 确像一首爱情诗。如头两句“高谊薄云霞 温和德行嘉。”润之之正好当此吗。“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这不像是说自己尚未许人么！想到这里，脸像火烧一样，忙辩白说：“你不要曲解人家的诗，我对你说了，是给李一纯的。”毛泽东说：“我最喜欢最后两句：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第一次北京之行，25岁的毛泽东开始了自己的初恋。

1919年年底，毛泽东率驱张（敬尧）代表团第二次到了北京，自然住在开慧家里。一年多来，鱼雁传书，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一天，开慧发现毛泽东晒在竹竿上的一件白衬衣破了，便取下来为他缝补。此事被妈妈看到了。作母亲的把这看作是他们“定情”的标志 因而非常高兴 告诉杨昌济和家里人说：“开慧帮毛先生补衬衣了，她还从来没补过衣服呢！”杨先生这时已沉痾在身，听到这话脸上露出了笑容。1920年1月16日，一代学人杨昌济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给老友章士钊写信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毛蔡二君 当代英才 望善视之。”章士钊是湖南长沙人 著名的革命党人，时任南方军政府议和代表，住在上海。

北京和长沙的教育界都为杨昌济开了追悼会，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参加守灵，帮助料理后事。父亲去逝后，杨开慧和母亲扶柩南下，将杨昌济的遗体归葬长沙板仓。

1920年4月，毛泽东到了上海。为给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友筹措路费，他拿着杨昌济的亲笔信，往访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对杨昌济的学问道德素来钦佩，见信后热情接待了毛泽东。见这个桑梓后生谈吐不凡，胸怀大志，觉得老朋友的眼光不差，遂答应尽力相助。数日后，筹集到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43年后，毛泽东对帮助他学习英文的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说：“行老（注：章士钊字行严）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于造反闹革命了。”

杨开慧回到长沙，得父亲生前好友的关照，进入福湘女中读书，和后来成为柳直荀烈士夫人的李淑一住在同一寝室。

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要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校长是洋牧师的夫人，思想守旧。她觉得这个北京来的学生，头发太短，思想太新，怀疑她是“过激派”。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过激派”往往是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贬称。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是一所教会学校的国文教员。他是杨昌济的生前好友。他出面保护杨开慧：“她父亲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和我是挚友，杨先生过世了。对她的后代，望教育界诸同人多加照顾。”

李肖聃在长沙教育界有名望，他出来说话，教会学校不好发作。

这年 7 月，毛泽东经上海回到长沙。在上海，他见到陈独秀。这时，陈独秀正和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他委托毛泽东回长沙后联络志同道合的人创建长沙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毛泽东回长沙后，开始秘密活动。一年前的“五四”运动中，长沙学生组织了省学生联合会。毛泽东介绍杨开慧参加省学联的活动。这时，湖南学界发动的驱张斗争取得胜利。利用这个声势，湖南学联进一步开展活动，提出废督裁兵，建设民治、普及教育的主张。

暑假期间，杨开慧奔走于各校，组织讲演队走上街头，宣传学联的主张。在毛泽东的启发下，杨开慧开始接触工人群众，她约了一个同学到火柴公司去为女工办识字班，借了一间堂屋作教室，自己编识字课本，自己刻蜡板。参加识字班的女工非常踊跃，很快由十几人发展到几百人，识字班也发展到 9 个。为杨开慧的热情所鼓舞，前来教课的同学达到 20 多人。

办工人识字班主要利用假日和晚间，有时回来晚了，学校关了门，同学们就翻墙而入。校长认为这些学生违反校规，追查下

来 校方指责杨开慧“来校一年 不做‘礼拜’，不读《圣经》 亵渎耶稣，破坏校规”，杨开慧毫不示弱，以“耶稣也讲自由，你们不能干预学生”来回答。结果，杨开慧离开了教会学校。

此时，湖南教育界、学界就妇女教育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男女同校”成为讨论中的热门话题，要开风气之先，需有勇敢者带头。杨开慧和毛泽东商量，毛泽东自然非常支持。于是，杨开慧串联了福湘、周南两女校的 5 名女学生，毅然进入岳云男子中学，成为全省男子中学中第一批女学生。这在封建顽固势力统治的湖南，需要非凡的魄力和胆识。

1920 年冬，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他们的恋爱是浪漫的，结婚也表现出对世俗、对传统的反叛。他们一不置嫁妆，二不坐花轿，三不布新房，四不办酒席，以同居来表示结婚，没有举行婚礼。过了一段时间，才请来一批人吃饭，吃到最后，他俩向客人宣布：我们结婚了。

当时毛泽东手握巨款。前面提到，为支持留法勤工俭学，章士钊募捐了两万块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支配，但公私分明的毛泽东不为自己动用一分一毫，不仅如此，向振熙老人为女儿办嫁妆的百十块银元，杨开慧也交给毛泽东用于创办文化书社的经费。

毛泽东和杨开慧平时都住在集体宿舍里。只结婚时同到板仓住了十几天。婚后，夫妻双双回到长沙，投入紧张的革命活动。

1921 年夏，毛泽东同何叔衡一起，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一大后，成立党的湘区委员会，委任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当时公开的社会身份是长沙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长，他便以这个名义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租了几间房子，作为区委的秘密机关。

1921 年冬，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成为当然的驻机关的秘密党员，杨开慧的母亲也跟着住在一起。

从 1920 年冬至 1927 年 8 月，毛泽东与杨开慧共同生活了 7

年。生育了岸英、岸青、岸龙 3 个孩子。杨开慧跟随毛泽东，时而在长沙，时而上海，时而广州，时而在武汉，四海为家。为了照顾毛泽东，她作为贤妻良母，默默地奉献了一切。

杨开慧是很有个性的。从其自述里看出，她甚至有些骄傲。但她融入毛泽东的生活中，她把毛泽东的生活当作她全部的生活，她的自我，体现在毛泽东的事业中。杨开慧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始终是毛泽东的眷属。国共合作实现后，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6 年中山舰事件后，还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杨开慧和母亲带着孩子伴随，也仍然是家属身份。但杨开慧对毛泽东做出的奉献，是不能磨灭的。7 年中，杨开慧生了 3 个孩子，每次毛泽东都因革命工作分不开身而无法在她身边。在恶劣的环境里，杨开慧不仅承担繁重的家务，还为毛泽东整理材料，做文字工作，无微不至地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还协助毛泽东从事工运、学运、农运工作。

目击者回忆道：

“开慧姐不愧是毛主席的亲爱的夫人和亲密的战友。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使毛主席有更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那时，毛主席常常通宵达旦写东西，寒冬腊月也是这样。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开慧姐就把取暖用具给毛主席准备好；深夜一两点钟，常起床取送临睡前热在锅里的‘点心’，有时候毛主席没顾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吃完后才去睡。那时候，毛主席夜里经常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早，又出去工作。她就去整理毛主席夜里写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那时，他们已有了孩子岸英。开慧姐在抄写文件时，常常把岸英的的摇篮放在身边，一边抄，一边用脚摇摇篮。”
(上海《文汇报》1977年10月5日)

杨开慧是这样地爱着毛泽东，她在一篇随感式的文章中写道：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

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个命运！”

毛泽东对杨开慧亦一往深情。

1923 年底，毛泽东奉中共中央之命离长沙到上海工作。分别之际，毛泽东填词一首赠爱妻：

《贺新郎·挥手从兹去》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那首答李淑一的词，是许许多多的人都熟知的：

《蝶恋花·答李淑一》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李淑一，长沙十中语文教师，杨开慧的密友，丈夫柳直荀是毛泽东的战友，1932年作战中牺牲。1957年2月，李淑一写了一首悼念亡夫的词寄给毛泽东，毛即以此词回答。

1962年11月，毛泽东的岳母、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病逝，毛泽东闻讯，发去悼念电报，其中嘱咐，“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

秋收起义，杨开慧与毛泽东分手以后，作为一个女革命家，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她在家乡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地下斗争。毛泽东初上井冈山，给杨开慧写过一封信，信中大意说，我在这里做买卖，赚了钱，生意兴隆，堪以告慰；并提到了自己的脚伤。发信地点是江西宁冈县×中药铺。开慧凝视着遒劲的笔迹，体味着含蓄的词句，激动万分。收到这封信后，杨开慧写了回信。但以后再也没有收到第二封信。1928年10月，杨开慧写了一首怀念毛泽东的诗。题名《偶感》：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党内同志和乡亲们很为杨开慧的安全担心，纷纷劝她离开板仓或送她到江西去，都被她拒绝了：“没有润之的指示，我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

1929年春夏之间，开慧给堂兄杨开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和我的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厉害——

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暴雨的侵袭！”明知死亡的凶险而不避，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对党的忠诚，对毛泽东的忠诚。

1930年，红军两次攻打长沙。湖南军阀何健把对朱毛红军的仇恨都发泄到杨开慧的身上。他出了一千银元的赏格捉拿杨开慧。杨开慧在群众掩护下躲过敌人几次追捕。1930年10月杨开慧潜回板仓看望母亲和孩子，被国民党密探发现。

她被敌人逮捕，8岁的毛岸英、保姆孙嫂也同被抓去。向振熙问：“8岁的孩子有什么罪？”敌人阴阳怪气地说：“带他进城玩玩，免得霞姑心挂两头。”

她被关在国民党的“清乡司令部”，怕有人劫狱，又转移长沙陆军监狱。转移时，押签上注明，“最严重的政治犯，女共党杨开慧一名，附小孩一名，女工一名。”

敌人软硬兼施，先之以软化，又施以酷刑，迫她交出地下党名单，交待和毛泽东联系的方法。杨开慧坚贞不屈，敌人一无所获。地下党、亲属紧张地进行营救，许多知名人士也出面保释。何健迫于压力，对下属交待：只要他同意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就交保释放，其他像地下党名单什么的，既问不出来，就不必问了。但得到的却是杨开慧义正辞严的回答：“让我和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一天，六舅妈来探监。开慧嘱托为她缝制一套内衣裤，带一点胭脂水粉来，还说要一面整容的小镜子。六舅妈心想开慧平日从不梳妆打扮，听了这异样的要求，知道她准备先“走”了，禁不住老泪长流。开慧却坚毅地说：“不要难过，请妈妈替我和润之

带好岸英、岸青、岸龙 3 个孩子，儿无憾。”

杨开慧遇害前，敌人最后一次来劝说，她义无反顾地回答：“牺牲小我，成功大我！”

1930 年 11 月 14 日，杨开慧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时年 29 岁。

一个月后，率红一方面军奋战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杨开慧遇难的消息，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他深感内疚。他给姻兄杨开智写信：“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银元 30 元为安葬之资。

毛泽东和杨开慧生有三子：毛崖英、毛岸青、毛岸龙。

杨开慧就义后，三个孩子先由外婆和祖母照看，往来于长沙，平江等地，东躲西藏继由党组织安排，前往上海。及至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三兄弟流落街头长达 5 年，老三岸龙在流浪中丢失，从此下落不明。老二岸青被坏人毒打，大脑受重伤，双耳被打聋，落下终身不治之症。直到 1937 年初，岸英兄弟被地下党找到，送往苏联，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境遇。

毛泽东 1927 年 8 月和杨开慧母子们分别。再见到毛岸英兄弟时，已是 19 年后的 1946 年。又 4 年后，毛岸英长眠于朝鲜国土。

为了共和国的创建，毛泽东牺牲的“小我”太多太多！

（二）贺子珍

她和他以同居表示婚姻的成立。

她和他共同生活的十年，是毛泽东几起几落的十年。

毛泽东一纸问候信实际上宣告了夫妻关系的终结。

1910 年的中秋节，贺子珍出生于江西永新的禾川镇。皓月当空，桂花飘香，婴儿皮肤洁净得像玲珑的桂圆肉，以此取名桂圆。要强的姑娘不喜欢这个软绵绵的名字，开始读书时，她自作主张

改名自珍。参加革命后，大家都习惯于叫她“子珍”，她也就入乡随俗地用起“子珍”这个名字，但最亲近的人，如毛泽东，知道她原叫“自珍”。

贺氏一家是非常典型的革命家庭。父亲原是开着一座店铺的小业主，爱结交，好抱打不平，在子女影响下参加革命，曾任中共吉安县委秘书长，中央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杀害。母亲长期在党的机关中做秘书工作，抗日战争后长途跋涉来到延安。贺子珍兄妹四人全都加入革命队伍。小弟弟在永新暴动时，为赤卫军送信，中途遇敌身亡。哥哥贺敏学，与井冈山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是同学。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和贺子珍等一起率农民武装上井冈山和王佐、袁文才部会合。妹妹贺怡，是毛泽覃的夫人，红军长征，她和毛泽覃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建国初，为回江西寻找毛泽东失散的儿子，不幸车祸入亡。

1925年，15岁的贺子珍在永新福音堂小学读书，那是一座教会学校。孙中山逝世时，洋先生不准学生举行悼念活动。贺子珍第一个站出来，她对同学们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他主张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他死了谁不难过，我们要悼念他！”她联合了18名同学，抗议校方的无理禁令。女牧师夜晚闯进女学生住的楼上，斥责她们“得罪了上帝”要她们跪下来向上帝“忏悔”。贺子珍拦住要下跪的同学，大声说：“我们没罪，用不着上帝的赦免！”

在学生的哄笑声中，女牧师只好退让。

1926年，贺子珍结识了中共永新县党组织的创始人欧阳洛、刘珍等人，并由他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热情奔放的贺子珍，组织一支妇女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妇女解放、反对迷信、除列强军阀。年仅16岁的贺子珍，担任中共永新县妇委书记和团委副书记。和当时几乎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她也加入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任县党部妇女部长。

贺子珍的名字开始在永新一带流传，是在大革命即将失败之际。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永新的国民党右派抓了几十名中共党员和工农骨干，贺敏学也被抓去。

贺子珍得到信息，和趁夜缒城逃出永新的贺怡一起，联络了刘珍、王怀、刘作述等党员带领莲花、永新、安福三县的农民自卫军，一举拿下永新县城，焚毁国民党伪政府，伪监狱，救出贺敏学等38名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的骨干。这在当时，称为“永新暴动”或“六一〇”暴动（时间是1927年6月10日）。

永新被农军攻占的消息不胫而走，贺子珍的名字也在永新一带传开，这一年她才17岁。

驻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派一营军队扑向永新。结果被农民武装设伏击退。

反动军队再次反扑过来，农军失利。在生死存亡关头，贺子珍、贺敏学和刘珍、刘作述等依靠两条半破枪、一排子弹和几把大刀，收集农民武装撤出永新向井冈山进发，与王佐、袁文才领导的农军汇合，成立宁（冈）永（新）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支进驻井冈山的农民武装。

1927年9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全军建立各级党的组织，从此共产党通过层层组织系统牢牢地把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

跟随袁文才在宁冈砦市一带活动的贺子珍听说三湾来了上千人的队伍，便建议派人探明情况。调查情况的人回来报告，这支队伍不放火、不抢东西，向农民宣传秋收暴动的作用。贺子珍听了非常高兴：“莫不是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来了？”不能完全断定，决定再派人去揭标语。贺子珍和贺怡领受这个任务，姐妹俩装扮成农家媳妇，暗藏枪支，沿着山间小道向三湾急趋。她们揭下工农革命军的5张标语，又恰好碰到毛泽东派来给袁文才送信

的人。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自然无不欢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由此可见，上井冈山，贺子珍比毛泽东还早4个月。开创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贺氏兄妹功不可没。在毛泽东上山之前，井冈山就有了“女首领”。他们来到井冈山，都有共同的动机，城市站不住脚，只能占山为“王”，先保存力量，再谋发展，都是退却，同时也是特殊形式的进攻。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结合也采取很自然的同居方式，贺子珍自己就说：“别说请酒，连喜糖也没有，在那种情况下，到哪去买糖？身上没有钱，也没有可能举行婚礼。”^①

贺子珍认识毛泽东前已有心上人，那即是前面提到的欧阳洛。欧阳是她的革命道路引路人，又介绍她入团、入党。他生得一表人才，是永新县最早一批到南昌求学、入党的人，他还是永新党组织的创建者，参加过南昌暴动，失败后回武汉任湖北省委书记，不久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杀害。

贺子珍1928年和毛泽东结婚。毛泽东35岁，贺子珍18岁。如果说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结合是纯真的缠绵，而贺子珍之于毛泽东，是硝烟战火中的激情遭遇，志同道合，则是他们婚姻的基础。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贺子珍和毛泽东结婚时，杨开慧正带着三个孩子隐蔽于湖南板仓。毛贺成婚后两年，杨开慧被何健杀害。这些，贺子珍是否知道？

毛泽东和贺子珍同居前，毛泽东对她忠实地讲了过去的婚姻状况。还说，传言说她已不在人世，不知是真是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白色恐怖下，革命者随时有生命危险的，何况因为和毛泽东的关系，杨开慧的目标太大。

1928年，杨开慧的堂兄杨开明以中共湖南特派员的身份来到

井冈山，毛泽东和贺子珍得知杨开慧的确切消息。从此，贺子珍就把自己的衣物装在一个包袱里，单放着，再不与毛泽东的衣物混放。贺子珍解释原因是：“什么时候你把开慧姐接来，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你。”她对毛泽东的真情，于此可见，她对他以身相许，也愿意为他的幸福而牺牲自己。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发，开始贺子珍不肯随毛泽东下山。其原因，就是贺子珍感到下山后毛泽东有更多的机会和杨开慧相会，她愿意把位置空出来让他们夫妻团聚。

和毛泽东结婚后，贺子珍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一边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一边为他剪报纸查资料，抄写稿件，职务则是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要秘书。

但贺子珍的独立性极强，这点她有别于杨开慧。她不甘心仅仅作为毛的夫人存在。认识毛泽东之前，她已在井冈山站住脚，成了女首领。因此，她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的十年中，对这种工作心理上一直难以适应。

尽管不适应，出于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和对毛泽东的一往深情，她还是尽力做好。

井冈山茅坪的八角楼，灯光总是亮到深夜，那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工作，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贺子珍则收集剪报资料，她神情专注地翻阅堆在面前的报纸，宛如沙里淘金，搜寻着有价值的新闻、报导，不时传来剪子的沙沙声。毛泽东的名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便凝含着贺子珍的心血。

为及时得到国民党的报纸，贺子珍也曾经冒着危险，加入“抢报队”，潜入敌人占据的城市去抢夺报纸。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到“左”倾领导的严重打击，他被解除兵权，丢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离开

军队，来到长汀县红军医院附属医院养病，贺子珍刚生小孩不久，不顾虚弱的身体，带着婴儿前来照顾毛泽东。

“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央，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毛泽东，病房前冷冷清清，毛泽东深感压抑。贺子珍在毛泽东遭受打击、排挤的时候，给他送来难得的慰藉。

当毛泽东遇到危难时，贺子珍首先想到的是丈夫的安全。1928年夏末秋初，毛泽东朱德深入前线观测地形，不幸被敌人包围，贺子珍为掩护朱毛安全转移，策马疾驰40余里，吸引敌人来追。她双手鸣枪，击倒几个追赶的敌人，安然回到红四军军部。由此，她得了“双枪女将”的名号。

贺子珍和毛泽东关系最融洽的一段是长征时期，生死与共、相濡以沫。长征经过贵州时，贺子珍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许多弹片限于当时的条件取不出来。毛泽东见状，流泪了。由于伤势过重，有人建议把她留在老乡家里疗养，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说留下来必死无疑，用担架抬也要带着她转移。毛泽东当时也生病，他把自己的担架让给贺子珍，改骑马。后来，贺子珍说：要不是毛泽东，她早死了。

贺子珍和毛泽东一样，个性比较倔强，两个人的碰撞也就较多。毛泽东有时很暴烈，吵起来挺凶，发起脾气来“雷霆万钧”。在延安，贺子珍见一小碗辣椒馊了，就随手倒掉。毛泽东发现了火气大发。他正在洗脸，连盆带水朝贺子珍泼过去。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起目睹的一件事：弄到一只鸡，毛泽东说炒着吃，贺子珍说炖着吃营养好，就为这点小事，互不相让，两人吵得要死。

但更主要的不融洽还是贺子珍的自主意识强。她爱毛泽东，肯为他献身，但她不甘心只是毛泽东的“家属”，她渴望独挡一面的工作。贺子珍要强、上进、好学，而毛泽东就希望她能安心于文件收发整理、剪报纸、抄写书稿的辅助性工作，同时照顾好他的生活。来延安后，毛泽东已是全党的领袖，有秘书班子，许多事

务性工作已用不着贺子珍去做了，贺仅仅是照料毛的生活而已，这更是贺子珍所不甘心的。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现在有发言权了。这意思很明白，我在党内的地位不会让你像以前那样跟着我受苦。但贺子珍听不进去。她只想独立地为党工作，从未想依靠毛泽东的地位给自己捞取什么。所有接触到贺子珍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她始终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出现，从不以主席夫人自居。在毛泽东已是党内最高领袖时，她还会离开他，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1937年8月，贺子珍离开延安。这一去她再也没有回到毛泽东身边。

贺子珍为什么打定主意离开延安呢？简单地回答，就是两个字：负气。

这有好几种说法，贺子珍自己的说法，应该是最有权威的。

1937年，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来到延安采访。为她当翻译的是吴广惠，吴在中国读完大学后，曾在中华戏剧学校任教，后来又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她的丈夫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有钱人家的子弟吴广惠1937年2月来延安，目的是考察延安的新教育方法。在延安，她烫着30年代城市女性最时髦的发型，还涂着口红。她始终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英语很好。

为了工作方便，安排史沫特莱和吴广惠住同一窑洞，史沫特莱住里间，吴广惠住外间。

史沫特莱同情中国革命，采访的需要，她和吴广惠必然多次接触毛泽东，谈得很投机，毛泽东热情接待。接触中，西方流行的握手、拥抱等礼节和男女间随便的勾肩搭背自然会由两位女士表现出来。

这在“男女授受不亲”毒害了几千年的中国，尤其是偏僻落后地区，30年代还是难以接受的。好事之徒再添油加醋地一渲染，